

## 瞿维、寄明:来自延安的作曲家夫妇

● 马信芳

徐汇区复兴西路34号的卫乐公寓,原名卫乐精舍,建于1934年。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优秀历史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维、寄明、黄准、吴强、峻青等一批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文化人在此居住。他们继续用笔讴歌我党光辉的历史和英雄人物,这些红色文化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瞿维(1917-2002)江苏常州人,原名瞿世雄。1933年就读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师范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10月赴陕甘宁边区。1940年起,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延安,瞿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就是与马可、张鲁等合作的歌剧《白毛女》。这部19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创作的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这部歌剧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这一特殊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

抗战胜利后,瞿维来到东北解放区。建国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曲、上海交响乐团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钢琴曲《花鼓》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歌曲》、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音乐《革命家庭》舞剧音乐《白毛女》等,正是他在卫乐公寓里创作出来的代表作品。

瞿维的爱人寄明(1917-1997)江苏淮安人,原名吴亚贞。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9年来到延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鲁艺、东北鲁艺教员,牡丹江鲁艺文工团副团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前辈参加了当年毛泽东发表演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寄明从事

电影音乐创作。1955年,寄明从北京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期间,她为《李时珍》《平凡的事业》《凤凰之歌》《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等多部电影创作了主题歌。

1958年,厦门和金门之间发生了炮战,它让全国人民知道了厦门何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炮火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后,厦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王添成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话剧《英雄小八路》。这引发了上海影剧作家周郁辉的关注,他把话剧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此片,把谱写影片主题歌的任务交给了寄明。

那天,在卫乐公寓的寓所里,寄明与丈夫瞿维商讨起来。为了让主题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据的事实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瞿维建议寄明到实地采风,以丰富素材。寄明采纳了瞿维的意见,专程到厦门,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们”,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时被孩子们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打动。她一边听,一边寻找最能体现影片主题的旋律。

采风快结束了,一个热情奔放、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疾书,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气呵成。寄明带着曲子回到家中,马上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连说好听。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正式上映,主题歌以其鲜明、朝气蓬勃的音乐形象,受到孩子们的喜爱。1978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意见后,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80年,歌曲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辛丑年伊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这“三牛”精神,成了很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指引”。牛年话“牛”,老牛身上那股子韧劲、默默奉献又踏实肯干的稳健,恰似我的家风传承。

我大姐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一代,早年家中兄弟姐妹多,父亲又常年在外地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与家人团聚。“长姐为母”,从小就善良顾家的她,正如鲁迅先生诗中的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她高中毕业,就匆匆去了大坝修水利,一个妙龄女子,

## 我家的“三牛精神”

● 李仙云

却干着壮年汉子的肩挑背扛的苦力活,只为多挣工分减轻母亲养育一大家人的艰辛。后来幸运地做了人民教师,她视学生如子,甘愿做学生的“孺子牛”。

若提到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拓荒牛”品质,我们家首当其冲让我想到的,就是我做警察的父亲。父亲在省公安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人烟罕迹的午岭大山深处,那里地处秦直古道,群山环绕僻静荒蛮,当年,父亲随一批批司法监狱系统的警察奔赴陕北,那时血气方刚的他们,以一种“不日新者必日退”的劲头,真可谓立下“愚公移山志”,用父亲常说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因地制宜而又借力使力,硬是把那片荒芜了千年的土地,开垦成良田千顷,场部、监狱、医院、子弟学校、各个站点齐备的“陕北小江南”。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则像一头默默耕种的“老黄牛”,除了春耕秋收,为我们做一日三餐,还得织布纺线,裁剪缝制一家人的衣服鞋袜。儿时,常常是一夜睡醒,睁开眼还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或纳鞋底。我也传承了母亲的这种“老黄牛精神”,高位截瘫虽将我困囿于轮椅,可用我灵活的双手洗衣做饭,在儿子幼小之时,还为他缝制棉衣。这些年来,我一边辅导他的功课,内心也随他共同成长,我把心语倾诉笔端,当我的文字在全国各地的杂志和报纸像鲜花般不断绽放,我也幸运地加入省作家协会,还被文友戏称为“女版史铁生”。

一次与儿子聊天,他说,篮球明星诺维斯基就是他人生的“图腾”,失败多少次都不轻言放弃,而妈妈身上也具备这种特质,其实就是一种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积极肯干的“老黄牛精神”,一次次带给他力量与勇气,而具备了这种精神,人生就会迎来柳暗花明。



■ 国画 徐联和

## 桂芬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

安慎坊位于虹口四川北路1649弄,是1920年后兴建的新式里弄住宅。这种建筑大多为三层的楼房,主房朝南,煤卫设备齐全,外形参照洋房,天井改为小花园,与石库门有很大不同。在上海近代史上,虹口地区原是美国租界,但清政府虽然承认了美国租界,却没有明确划定一条界线,所以美国租界和华界的界限比较模糊。安慎坊正好在租界的范围之外。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虹口一带就属于英美租界,1899年后又变成了公共租界。随着后来入住虹口的日本侨民增多,虹口一带曾被误认为日租界。实际上,上海近代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日租界。20世纪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应付战争,我国的民族工业趁机得到发展,广东人来沪投资日益见多,安慎坊所在的虹口一带都成了广东人的聚居地。

安慎坊共有3条长弄堂,在四川北路上有2个弄口(一为四川北路1649弄,一为四川北路1635弄),另有横弄通新乡路和东宝兴路。安慎坊

32号正好处在通东宝兴路230弄的横弄上,出行十分方便。

1926年春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辗转多处后暂时设在安慎坊32号。这一地址的选择,相信并不是偶然的。1925年1月,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东宝兴路230弄安慎坊32号与此会址仅一弄之隔。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宣传部委员,这5人组成中央局。从中共中央工农部当时也设于安慎坊32号来看,“四大”会址和安慎坊32号应当是通盘考虑后定下的,有一定关联性。这也符合1922年秋季以后党的各个机关将机关地址选在华界的惯例。

安慎坊32号是在1926年春租下的,彭述之、郑超麟、黄玠然、羊牧之均在这里居住过。前楼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主任彭述之、陈碧兰夫妇的寓所;过街楼是宣传部的办公室、《向导》编辑室,彭述之、沈雁冰、羊牧之、郑超麟等均在此办公,除了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工人》,还编辑《新青年》丛书;后间是黄玠然居住的地方;郑超麟居住在三楼亭子间。

这里还召开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时的五大常委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来过此地,中共中央主席团有时也在此开会。1927年3-4月,陈独秀来此居住,就住在原来郑超麟住过的亭子间。1927年3月,顾顺章曾在这里向陈独秀汇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等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此处停止办公;中央迁至武汉后,此地为中央交通处,由石琮管理。以后,周恩来曾在此地居住过,并在此接见过中共“五大”代表徐彬如,安排其做军委工作。

2003年,安慎坊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

## 安慎坊,「红色声音」指挥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遗址